

名家近况

阅读孙甘露——

# 抚琴动操，山水皆响

李 舫

那一年腊月十五的上海，离春节还有十来天，一场秘密集会正要开始。10点左右，卫达夫、易君年、凌汶、秦传安、田非、崔文泰、林石、董慧文前后走进会场，进入菜场三楼和四楼之间的夹层，他们身份不同，角色不同，大都素不相识，相同的只有一点——他们都是隐蔽战线的中共党员。会场中间放了一张长桌，进来的每个人都要从口袋里摸出骨牌放到桌上——这是事前约定的暗号。该来的人已经到齐，但会议召集人老方却没有到场。就在此时，龙华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侦缉队长游天啸，带领侦缉队包抄了会场。一个不知名的人不惜从楼上跳下，拼死为这个秘密会议报警。易君年指挥大家四散逃离，然而，为时已晚，没有跑散的人悉数被捕。

——这是孙甘露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的开篇。时间退回到89年前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这是1933年，近代中国最黑暗的年代，四处弥漫白色恐怖，民族危亡日益深重——日本侵略军攻陷山海关并向热河发起进攻；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的军事“围剿”；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签订“塘沽协定”，承认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并将察北、冀北让给日本侵略者。在塘沽日本陆军运输派出所举行的中日停战谈判桌上，日方代表冈村宁次拿出事先印好的协定草案，要求中方在一个半小时内答复，一字不许更改，中方代表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塘沽协定》生效。这一年，中共中央致信满洲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指示发动东北人民武装抗日；上海总工会发表《告全国工友书》，提出要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厉行抵货，加紧抗日。也是这一年，中国共产党革命的重心逐渐从大城市向南方农村转移，为保存革命火种，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由上海迁至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

那是那个年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也是这部小说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孙甘露的小说，便来源于中共中央重大战略转移时的真实故事。1933年，中共中央战略转移进入最后阶段，中央特派员老开来到上海，要组成一个小组执行中央的特别任务。十几个人被召集到图书馆一间隐秘的房间里来开会，他们相互之间多半不认识。然而，就在这十几个人里竟有两人是国民党安插的内奸，如果不是潜伏在敌人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以生命阻止了会议的召开，中央的特别任务就轻而易举地被国民党掌握了，其后果不堪设想。这些来参加会议的地下党成员全部被关进了国民党监狱。可是，他们很快被放了出来，狡猾的敌人想放出他们作为“诱饵”钓到共产党的高层。就是在这样的严峻形势

下，陈千里受命前赴上海，协助完成党的特别任务。在陈千里的带领下，一群怀抱信仰的热血青年行动起来，试图粉碎敌人的阴谋，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

小说的人物让人眼花缭乱。方云平、陈千里、叶启年、浩瀚、卫达夫、游天啸、易君年、凌汶、秦传安、陈千元、穆川、田非、崔文泰、林石、董慧文、李汉、梁士超……他们似敌似友或亦敌亦友或非敌非友，他们是兄弟或战友或对手，他们在漆黑的夜里开始一段深不可测的航程。孤寂的至暗时刻，一个人看到什么，愿意看到什么，或许他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小说的叙事让人欲罢不能。这是一场事先张扬的险战，一个危险的绝密计划，一部沉浸式烧脑小说，引出一群在焦灼乱世中藏起过往、躬身入局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怀抱信仰，以激情与勇敢投身伟大事业，从此走上抛头颅洒热血的不归之路。在孙甘露笔下期待光明的隐蔽战线，也是黑暗纠葛的人性战场，它塑造英雄，也呈现脆弱。善与恶，罪与罚，贪婪与恐惧，爱与信仰，在小说中得以叠加和蔓延——这是一种信念的考验。

小说中的场景让人流连忘返。上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广州、南京的市井街巷，有着一批地下党员的身影。孙甘露像拿着一张地图，或像拎着一盏夜灯，带领读者走进现场，不动声色地复刻了一幅幅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场景，写出一场场曲折迂回、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这部印满了岁月刻痕的风物志，重现了上世纪30年代上海、广州、南京的日常生活，建筑、街道、饮食、风物和文化娱乐，一条马路、一件大衣、一出戏、一道菜肴或一部交响曲——这是一种历史的再现。

风雨满山川，莫道行路难。信念如灯，照亮了革命者的沉沉暗夜、漫漫长路，也照亮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征程。

孙甘露调动了多年的文学积累和创作经验，在小说结构、人物塑形、语言速度等文学手段上进行了探索，创新了主题小说的叙事范式，调整小说节奏快，情节密度高，语言质感强，在危机迭爆的惊心动魄中飞速推进，形成了一种激情美学叙事的动态结构。同时，孙甘露赋予小说人物以合理真实的人性逻辑，洞察焦灼乱世下每个人的内心世界。极端环境下的忠诚与背叛以及爱与别离，动人的情感叙事让小说在澎湃的动态中蕴含着平静之气，展现了孙甘露对当代小说叙事走向的思索和试验，整部小说在动态氛围和静态气息之间取得了动静相宜的平衡。

大约8年前，上海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本书，书名饶是有趣——《为什么要读孙甘露》。对于一位中国作家来说，这提问甚是突兀狡黠，更似乎欲



孙甘露

郭红松绘



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

擒纵。是啊，对于中国当代读者来说，我们有必要询问，为什么要读孙甘露？答案有很多，评论家陈晓明给出的理由让人过目难忘：“有必要读一读孙甘露的小说，否则，人们不能说领略到当代中国小说的最险峻的风光。”读孙甘露的作品，需要力量，需要阅历，更需要智慧。

孙甘露，1959年出生于上海，中国先锋派文学代表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有《信使之函》《访问梦境》《呼吸》等，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日等多种语言，收入海内外多种文学选集。写作之外，他还担任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主持上海国际文学周、思南读书会。一言以蔽之，孙甘露的写作和文学活动，体现了当代文学史的重要样式。

孙甘露是一位成熟的、颇具个人创作风格的作家。成熟，从正面说是对一位作家的高度肯定，然而同时，对两个字也意味着一种“危险”。也就是说，成熟的作家不论创作思路还是叙事模式，都会不知不觉地陷入自己的套路和旧路，这种习惯性创作冲动很有可能将作者自己甚至读者带入写作困境和阅读困境。然而，读罢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我们更加惊喜地发现，孙甘露其实是一位能够发现自己文学创作惯性冲动同时又能够加以克服的自省型和自觉型作家，他用他的主动转型，用不时走入空白和荒芜的自觉，时时给我们带来惊喜。

孙甘露惜墨如金，他的作品不多，却每一部、每一篇都耐人寻味。在他的作品《时间玩偶》中，孙甘露这样写道：“在童年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幻觉，我将要度过的一生是我的生命的一个次要的部分，而我生命的核心，会以另一种方式，在另一种历史中存在。它逼真到我触手可及的程度，就像无数次地触摸自己的身体——真实中的虚幻、色情、慰藉以及悲痛。”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初读这部作品时的震撼，作家的语言竟然可以做到如此充盈、如此丰富，织就如此细密的时间迷宫。

孙甘露是一个早就深刻体会到“此地是他乡”的作家。他一直在阅读，读书、读他居住和热爱的城市——上海，他同他的城市互相启发，将感受和理解推向更深处。《千里江山图》是孙甘露基于热爱、阅读、居住之下的写作。他从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历史档案和时间碎片里，打捞隐秘而静穆的人物和事件，用文学的方式去想象和呈现它的过程。他如同一位炉火纯青的工匠，打撈散落历史尘埃深处的琐碎细节，捏土为骨，化泥为肉，凝聚起他们和它们的精神和血肉，打造看似一个扑朔迷离、实则逻辑清晰的故事，请读者同他一道躬身自省。

孙甘露的小说，热闹中有沉思，喧嚣中有敬畏，空阔间有肃穆。他仿佛是一个出神入化的乐师，抚琴动操，众山

皆响。

套用孙甘露评价印度裔英国作家V.S.奈保尔的一句话——假如你错过了孙甘露，就错过了惊涛骇浪。孙甘露的写作内省而节制，他擅长在语言迷宫中布置无数精巧的机关，这些机关像早晨的露珠一般散落在优雅的文字里，而喻体和喻指的遥远距离令人印象深刻，它们牵引着读者的寻宝猎奇心，他们追随着他的机关的陷阱“自甘堕落”。

也许可以这样说，因为有了孙甘露的存在，文学才成为文字的迷宫。他写上海，悄悄地将迷宫的钥匙交给读者：“过去的上海当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过去的时代，它对今日的上海人来说是具有特定含义的，它有一种紧密的上下文关系，它是由今日文化的境遇来界定的，它是历史环境的产物。人们怀念的是一种不可见的生活方式，它的动力来源于它的虚幻，它的无处不在和它的无处可寻。”

孙甘露的语言是玲珑的、别致的、诡谲的，充满了梦的呢喃，不论在小说还是在散文中，它们都美得令人窒息、令人心碎，且听——

“与此同时，在远方山脉的另一侧，一些面容枯淡的人预言：一切静止的东西终将行走。于是，树开始生长。平原梦想它们褪去了干草和瓦砾的遮掩，向临近他们的人物和故事开始吟唱追忆的歌曲。世纪的帷幕拉上了。死者的窗户也已关闭。一只手在我的眼帘下画下了另一只手。”

“我行走着，犹如我的想象行走着。我前方的街道以一种透视的方式向深处延伸。我开始进入一部打开的书，它的扉页上标明了几处必读的段落和可以略去的部分。它们街灯般地闪亮在昏暗的视野里，不指示方向，但大致勾画了前景。它的迷人之处在于众多的建筑以掩饰的方式所加强，一如神话为森林以迷官似的路径通向年代久远的未来。它的每一页都是一种新建筑。”

孙甘露的作品正如他的名字，甘若醴酪，露肝披胆，见功夫，见知识，见情怀，见境界。他是中国当代为数不多的先锋派作家之一，也是始终坚持多元化创作试验的作家之一，他曾经评价自己的转变：“现代派这张桌子已经早就撤走了”，“在先锋思潮中看到了软弱、无力、缺乏等种种症候”。他始终守望在文学的第一现场，将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和遥远的未来，他一次次见证苦难席卷而来，一次次见证生命浴火重生，见证中华民族的伟大与幽微、辽阔与细密，见证信念的种子如何在时代的风雪里生根发芽。

我们不妨称呼它们是“孙甘露体”。“孙甘露体”铸就他独特的语言风格，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跟着他在岁月间穿行，在光影中徘徊，拂一拂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只留优雅的回声叠加在浮世的影像之上。

## 中国作协、山西省共同举办座谈会 纪念“人民作家”马烽诞辰百年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今年是“山药蛋派”代表作家马烽诞辰一百周年，这位“人民作家”不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留下了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吕梁英雄传》《我的第一个上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泪痕》等作品，至今仍留在广大读者记忆里。

6月15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山西省主办的“马烽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宏森主持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马烽的人生和创作道路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坚持人民性、民族性、大众化是马烽最突出的创作特点，发现和表现时代变化中的新人物、新精神是马烽自觉的文学追求，要学习他矢志不渝投身党和人民事业、自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懈探索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精神。

在散文中，有一类题材几乎为所有写作者青睐，那就是亲情散文。所谓“亲情散文”，是指以家人亲戚为叙写对象，抒发亲情感应的散文类型。情感是散文的核心元素，而亲情无疑是情感中最柔软、最真挚、最动人的部分。这类散文不用面壁虚构，不用绞尽脑汁，只要调动情感积累和生活记忆，下笔即如打开了水龙头。

然而，亲情散文易写难工，要想在文学性和思想性上达到“文质兼美”的效果，避免同质化、程式化，令读者耳目一新，有几个方面需要留意。首先，在主题表达上可以更加丰富多元。对亲情的赞美，是每个写作者发自内心的声音，也是亲情散文的一个特色和长处，文学史上留下的诸多名篇就说明了这一点。写父母勤劳、善良、节俭、无私乃至伟大，“父爱如山”“母爱如水”，都是作者的真情流露。与此同时，也可以通过其他主题表达，将亲情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体现出来，更深刻地表情达意。其次，陈年往事，流金岁月，绵绵不绝的思念和缅怀，能够将亲人过去的点点滴滴勾连还原，在叙述形态上这是写过去。除此之外，是否也可以写“现在时”呢？将回忆与对亲情的动态描摹结合起来，也许会更加生动鲜活。

那么，该如何推陈出新，创作出具有崭新审美气象的亲情散文呢？我们可以从一些散文名篇中，获得有益启发。

首先要选择独特的叙述视角。中国古代诗文皆有托物寄情的艺术传统，将感情附着于具体的物象上，或选择一个观察与抒发的角度，这样比大水漫灌式的叙述更清晰，给人印象更深。如朱自清的名篇《背影》，写一个父亲对远行儿子的慈爱，将视点聚焦在父亲的“背影”上，——那个穿过铁道、费力爬上月台去买橘子的肥胖踉跄的背影，成为父爱的经典符号。铁扬的《母亲的碗》，选取一个道具——大碗来写母亲。勤俭节俭的母亲只有在生日时才拿出大碗吃饭，这只大碗跟母亲生命中的重要时刻紧密联系在一起。大碗里盛放的是饭食，同时又盛满了庄重、尊敬、怀念等种种精神元素，是写实，也是隐喻和象征。

其次是写出独特的生命体验。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其实幸福的家庭也各有各的生活况味。在亲情散文写作中，不能只看到“相似性”，而要写出共性的个性。如彭程的《对坐》，作者选取了一个日常生活场景，与年老的父母相对而坐，这是我们很多人都有的经历。但细心的作者在默默流逝的光阴里却别有一番深刻洞悉，“生命是一个缓慢的流程，在成长、旺盛和衰颓之间，他们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渐行渐远”。与父母“对坐”的短暂驻留，终会迎来永久的分离，这种感觉真实到残酷。但作者又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的清醒，反面恰恰是珍惜。汪曾祺的《多年父子成兄弟》写父子之情，温情脉脉，“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儿敬畏，子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代际间的尊重理解是重要的，“多年父子成兄弟”是作者眼中平等、民主的现代家庭关系的理想境界。汪曾祺将个人体验升华到思想层面，用文字留下了一个经典的亲情范式。

第三是要在人性深度开掘上着力。应当承认，家庭关系与亲情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最纠葛的关系。爱，不全是温暖，不恰当的爱有时也是一种负担甚至伤害，人性的深刻和复杂或许在这里比别处更能得到烛照。但是，出于避讳等原因，作者往往不愿写亲情关系中不如意、不和谐的一面，单纯赞美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其实，亲人间的隔膜如何消除、矛盾如何化解以及如何相互理解和体谅对方，更为重要。如陈福民的《与你遥遥相望》，几乎颠覆了以往作品中的母亲形象，他不着力颂扬母亲善良、勤劳等美德，也不着力抒发自己的缅怀和思念，而是将亲子关系推到一个更为平等的对话层面。“遥遥相望”一语充满了无奈与辛酸，拓展了亲情关系的另一个维度。彭学明的长篇散文《娘》，是一部忏悔书，他的震撼之处，不是讲述了母亲命运多舛的人生，而是推心注血地袒露作为人对母亲的种种不恭，从而揭露出母子亲情不对等的普遍现象，引人自省。作者敢于自我解剖的非凡勇气委实罕见。

契诃夫尝言，“独创是艺术的生命”。在亲情散文写作上，作者应尽力走出舒适区，规避艺术窠臼，在选题、立意、呈现等方面悉心揣摩，自出机杼，则佳作可期。（作者系河北省作协副主席）

◎百家谈

## 散文如何写亲情

刘江滨



孙甘露部分作品的海外译本

新作评介

## 一片童心向祖国 ——儿童纪实文学《中国的孩子》读后

李朝全

曾平标、廖子馨的长篇儿童纪实文学《中国的孩子》从孩子视角切入，全面立体地展现出澳门对祖国母亲的深厚情感和赤子情怀。作者以纪实手法，追溯阔一多当年创作《七子之歌》的历史背景及经过，回顾澳门这个游子于1999年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历程。作者也写澳门回归之后，澳门孩子迅速融入祖国大家庭，了解熟悉祖国历史和文化的故事，角度新颖。

《中国的孩子》擅长运用典型事例来阐释和表现作品主题。全书采用的是

一种串糖葫芦式的结构，将10个典型事例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文学故事矩阵，全方位展现澳门与内地情同手足、亲如一家、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书中讲述了内地为澳门供水，在春节“水荒”时硬是“抢”出了2000多万立方米的“救命水”供给澳门；内地倾情建设智慧生态农场，确保澳门百姓的“菜篮子”和饮食安全无忧等动人故事。作者也浓墨重彩地描写了澳门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譬如，濠江中学在澳门回归时升旗，老校长杜岚奶奶特别激动，把拐杖

一丢直奔升旗台而去；国旗手接受培训时，国旗不慎滑落，国旗手立刻扑过去，将国旗牢牢举起，避免触地；澳门的学校与贵州的学校结为“姐妹学校”，进行对口帮扶，提升办学条件；澳门孩子主动学习粤剧，传承传统文化，共唱《七子之歌》等。作者善于用儿童视角、儿童语言讲故事，回忆历史，给读者以亲切感和亲和力，有力体现了爱国主义教育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的熏陶与培育。

《中国的孩子》真实呈现澳门孩子



的家国情怀，生动表现了澳门与祖国永远不可分割的主题，彰显国家认同、高扬爱国主义，是一部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的优秀作品。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研究员）